

# “妇人之仁”与“明主之仁”

□ 冯敏飞

谥号是在人死之后，后人依据他生前表现，盖棺定论，予以一种称号。这种称号分三类，即美、平、恶。美谥是褒，恶谥是贬，平谥是怜。恶谥如暴、昏、炆、厉等，希望通过这种评价，让后任帝王有所顾忌，自我约束。得到美谥的帝王居多，最常见的是“武帝”“文帝”，似乎每一个朝代开国那一两代都是武功文治。还有“孝”“英”“哲”等等。号称“仁”的也不少，如西夏仁宗李仁孝、西辽仁宗耶律夷列、明仁宗朱高炽、清仁宗爱新觉罗·颙琰。北宋仁宗赵祯也是其中之一，且为史上第一位“仁宗”。

赵祯之“仁”是颇为贴切的。作为一个皇帝，吃喝玩乐实在是不成问题，可赵祯却做到了防微杜渐。一天加班到半夜，赵祯饿了，很想吃碗羊肉热汤，但最终忍了，第二天与皇后闲谈时才说起。皇后怨道：“陛下日夜操劳，想吃随时吩咐御厨就是，怎能让龙体受饥？”赵祯说：“朕昨夜如果吃了羊肉汤，御厨就会夜夜宰杀，一年下来数百只，形成定例。为朕一碗饮食，创此恶例，于心不忍！”还有一次，谏官王素劝赵祯不要亲近女色，赵祯说：“近日，王德用确有美女进献，我很中意。”王素坚持说：“臣今日进谏，正是怕陛下为女色所惑。”赵祯只好下令：“王德用送来的女子，每人各赠钱300贯，马上送离宫中。”王素慌忙说：“不必如此匆忙！既然已经进宫，还是过一段时



间再打发为妥。”赵祯笑道：“朕虽为帝王，与平民一样重情。我怕久了，会不忍心送走。”于是对这些女子厚礼相赠，送出宫中。对于宋仁宗，后世一向好评如潮。很不谦虚的乾隆说他只佩服三个皇帝：一是他的祖父康熙，二是李世民，第三个就是赵祯。

再从武功的角度考察，有些人总抱怨宋朝军事太弱，不如汉唐威风，但大宋确实生不逢时，燕云十六州早被出卖，失去了长城屏障，更重要的是对手不再是匈奴那样的“流寇”，而是比汉和唐对抗的单纯游牧民族要厉害多的辽、西夏、金等，他们具有以汉人方式对付游牧族和以游牧族方式对付汉人的双重优越性，所以不能把汉唐和宋作简单对比。实际上，在宋仁宗时期，大宋已经破了西夏占领关中的战略目标。

那么，宋仁宗是完人吗？当然不是。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指出：“计此三十年间，人才之黜陟，国政之兴革，一彼一此，不能以终

岁。吏无适守，民无适从，天下之若惊若鶩、延颈举趾、不一其情者，不知其何似，而大概可思矣……夫天子之无定志也，既若此矣。”此言甚是。宋仁宗使命感很强，很想主动解决盛世的“久安之弊”，要求范仲淹开列当务之急。范仲淹不失理智，认为“非朝夕可革”，所以“始未奉诏，每辞以事大不可忽致”。仁宗一再派人催促，朝野舆论压力增大，范仲淹这才上呈改革方案，付诸实施。结果使得利益分配突然失衡，形成了党争。欧阳修写了那篇著名的《朋党论》，指责范仲淹等人搞“朋党”。鉴于历史教训，宋朝皇帝最忌武将领兵与文官结党。范仲淹被指责搞朋党，让仁宗吓了一跳，于是马上缩回去，叫停改革，并罢免了范仲淹的官职。

近代历史学家蔡东藩评论道：“仁宗之驾驭中外，未尝不明，而失之于柔……仁宗以仁称，吾谓乃妇人之仁，非明主之仁。”这话似乎太过，但不无道理。

如何才是“明主之仁”而不是

“妇人之仁”，并没有标准答案。思索之际，笔者又想到了范仲淹。他的10项改革内容，其中“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5项属于吏治，另外还有“重命令”“推恩信”2项与吏治有关，总计70%涉及政治体制。他派一批官员深入各地去现场考核，自己坐镇中央指挥，将各地报来不称职的名字一个个勾掉撤职。枢密副使富弼在旁看不过去，提醒说：“您一笔勾了很容易，但这一笔下去要让他一家人哭啊！”范仲淹回答：“一家人哭总比一路人哭要好吧！”当时的“路”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省”，范仲淹想的是大局。这就涉及“妇人之仁”与“明主之仁”的区别了。不忍心看一家人哭，而不惜让一路人哭，显然是“妇人之仁”，而非“明主之仁”。

作为一个明主，就应当为了一国人不哭，而不惜让某一家几家人哭。那些平时鸚鵡学舌跟着范仲淹大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官员，一到改革，哪怕影响点“灰色收入”就受不了，就要反对，要滋事。如此，宋仁宗却一味地“仁”，不惜迁就那些少数人，叫停改革，牺牲了范仲淹和新政，还让弊政继续积累，从而让朝政危机由隐到显，由轻到重，显然不是“明主之仁”，而只是“妇人之仁”。



## 琅琊王氏家风底色：立德立功立言

□ 赵 威

古代中国是一个家国同构的社会，魏晋南北朝时期，皇权式微，家族地位凸显，涌现出许多簪缨世家，影响历史发展。琅琊王氏是其佼佼者。琅琊王氏自汉代步入历史舞台，历经两晋的兴盛，流风余韵延续至隋唐之世，数百年冠冕不绝，固然与外在之社会政治、经济财力有关，但像他们一样能保持门户不衰的并不多见，这与其良好家风文化有莫大关系。家风是家族的精神文化传统，关乎家族文化的底色和基调，琅琊王氏家风的底色便是立德、立功、立言。

立德：重视礼法、孝友传家

琅琊王氏第一代人物是西汉时期的大儒王吉。汉武帝独尊儒术，士子通一经便可以入仕，而王吉通五经，以高起点步入仕途，后来通过举孝廉，平步青云，地位日显。王氏家风的奠定者当属二十四孝之一的王祥，他是王吉以下第六代，“卧冰求鲤”的主角就是他。王祥的故事类似于上古舜帝的事迹，生母早逝，继母和父亲对其非打即骂，他反而更加恭敬地孝敬父母。面对继母的中伤、迫害，他仍能“笃孝至纯”。父母生病，王祥衣不解带，日夜照顾，汤药必亲自尝过后，再给父母服用。天寒地冻，继母想吃鲜鱼，他脱衣卧于河冰之上，冰被暖化，孝感天地，从冰下跃出两尾鲤鱼。故事经过民间演绎，自然有夸张之处，但王祥的孝在当时是传为佳话的。王祥对兄弟王览也是爱护有加，兄友弟恭，远近闻名，时人把他们的居所称作“孝悌里”。王祥临终前留下的“五至”遗训，成为此后琅琊王氏一族长期遵循的家训：“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过，德之至也；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临财莫过让。此五者，立身之本。”信、德、孝、悌、让的“五至”遗训是琅琊王氏家族子弟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诚信做人，诚实做事，孝敬长辈，兄弟之间互相爱护，不过分看重钱财，这样才能保持家族和睦兴盛。史书记载，琅琊王氏“子孙皆奉而行之”，重教子，

尚孝悌，以孝友传家。

同为琅琊王氏的王戎，是竹林七贤之一，也是晋代有名的孝子。晋武帝时，王戎母亲去世，他照常喝酒吃肉，看似逾越礼制，实则内心悲恸，哀伤得起身都得借助拐杖。而尚书和峤同时遭母丧，虽寝苫枕块、粗茶淡饭，但只是表面上的礼节，而气色不衰。时人称王戎为“死孝”。两晋时期，玄风昌炽，士人崇尚清淡，以放浪形骸为高玄境界。然而，高谈阔论的玄言虽然能博得一时声誉，容易走红，却很难助力家族文化的长远发展。王氏子孙少有这样任诞简傲之徒，恐怕也与其秉承礼法持家的家风有关。

立功：与时推迁、建立事功

有人根据二十四史中的记载统计，从汉代到明清，琅琊王氏家族共培养出了王导、王睿、王湛等92位宰辅和王融、王羲之、王献之等600余位名士，任何一个中古家族都难以匹望其项背，这种家族成就无疑得益于王氏家风中“与时推迁”的应世态度。

“与时推迁”的应世态度是一种积极入世、建立事功、不落窠臼、不尽愚忠的处世哲学。王祥是王氏家风的奠定者，王导则是王氏走向极盛的引领者。晋室衣冠南渡，王导与堂兄王敦一内一外协助司马睿建立东晋。王导安抚南渡的北方士族，联络南方士族，极力调和二者之间的矛盾，为稳定江东局面，立下汗马功劳，时人言“王与马，共天下”，道出了王导对晋朝的再造之功。

坚定地支持东晋抵御北方胡族的进攻，寻机克服神州，这是王导一生的志向。为了这一志向，宽络江东士族，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他积极寻求与江左名门世家通婚。当时的吴语是北人和江东人士都羞于使用的方言，而王导入乡随俗，不惜屈尊学习吴语。一次盛夏时，驸马爷刘惔前去拜会王导，看到他把弹棋棋盘贴在腹部降温，嘴里还说道：“怎么这样淘？”“淘”是古代吴地方言，意为“凉”。刘惔离开后，有人问他见到王丞相怎么样，刘惔说：“未见到有什么特别的，只听到他满嘴吴语罢了。”

王导调和南北矛盾的同时，也别忘了身为近臣要时刻规劝皇帝的职责，他成功劝谏司马睿戒酒、放弃随意改变储君等。一次，晋明帝当着王导的面，询问中书令温峤晋朝得天下的原因。温峤尚未回答，王导上前一步，说：“温峤年轻不熟悉本朝旧事，我来为陛下陈述。”王导便详细地讲述了司马懿创业初始，诛杀名门望族，宠信培植亲近之人，一直讲到司马昭除掉魏帝高贵乡公曹髦等不光彩的事情。王导以此来规劝晋明帝要远小人，行德政。明帝听后很内疚，掩面伏于坐榻之上说：“如公所言，晋室皇祚安得长久！”

历史进入南朝，琅琊王氏子弟王弘、王昙首先后辅助刘裕、刘义隆父子建国称帝，将王氏家族再次推向鼎盛；齐代宋，王俭对萧道成的功业立有大功。虽然这种“与时推迁，为新朝佐命，以自保其家世，虽朝市革易，而我之门第如故”的做法，为一些人所诟病，但是放眼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也不过是一部帝王易代的周期率而已。只要顺应历史发展，不为腐朽王朝尽愚忠，维护安定大局，尽可能减少战乱，让百姓少受乱离之苦，就是对历史有功。不为一家一姓尽忠，而为国民建立事功，是琅琊王氏家风的成功之处。

立言：培养家学、诗书传家

作为个人，若缺少文化知识的熏陶滋润，便难有君子之风，所谓“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同样，一个家族若缺少学识文化底蕴，其家风层次也不会太高，更难持久。因此，家风的高下不在于家族中出过多少大官、多少大款，而在于文化之高下。除了立德、立功，琅琊王氏家族的另一个治家之道便是立言，注重家学养成，做文化世家，家学与家风互为促进。琅琊王氏的家族文化最初便是以经学立世，王吉就是西汉时代的五经博士。

以文化立家是琅琊王氏家族绵延不绝的根基，然而，其成功的诀窍不全在此，而是家族文化所具有的包容性和多元性，每每能够走在时代前列，引领社会文化风尚。这

一家学风气来自实践，起初，因举贤良，王吉被推荐为昌邑王刘贺的中尉。通过经学，王氏家族开始与政治紧密地结合，并成为家族发展的巨大推动力。

汉末军阀割据，经学一统天下的局面也随之解体，社会思潮复现多元化。从王祥开始，就已经“理致清远”，王氏家族开始由道家而玄学，王戎和王衍就是当时的玄学家。史家陈寅恪曾分析说：“若王吉、贡禹、甘忠可等者，可谓上承齐学有渊源，下启天师之道术。而后来琅琊王氏子孙之为五斗米教徒，必其地域熏习，家世遗传，由来已久。”

晋初，崇尚名教的是辅助司马氏夺取政权的人，而标榜老庄之学的则是与司马氏不合作的人。对名教与自然的主张事关政治立场，与他人不同的是，王戎提出调和儒学与玄学的主张，“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王戎认为二者“将无同”。到了后来，王导因袭了这一主张，王氏家族儒玄兼修，在与清谈大家殷浩等人的一次长谈中，王导提出以儒学治国、以玄学生活的主张，在他的理论中，玄学是被儒家思想支配的工具，当然，其目的仍是为现实服务，结交南北世家，共同维护江左政权的稳定。

另外，王氏子弟在佛学、文学、书法、绘画等领域也多有建树。王氏家风不允许不学无术的王氏子弟存在，对子弟教育上，倾注大量心血，且不时自我警醒。因此，王家注重名士集会，作为熏陶培养子弟的机会，最著名的当属王羲之召集的兰亭雅集，就连年仅9岁的小儿子王献之也在列，可见其对子弟的培养是不遗余力的。

家风本身就是一种家族文化，它既是家族历史的积淀，又是家族文化的传承。琅琊王氏家风的底色是立德、立功、立言，树立高尚的道德，为国为民建立功绩，培养家族文化底蕴，保持了王氏家族的长盛不衰，这便是祖德家风带来的文化力量。



相比曹丕，曹睿似乎在志向气度宽仁方面略好，在开疆拓土方面有所建树，亦常能虚心纳谏，却才疏而多欲，于识人用人上也缺乏深刻洞察力，由此也便注定了他在位亦难以真正聚拢人才、凝聚人心，临终又托孤失当，最终导致曹魏政权旁落。

开局是好的

曹睿大约20来岁时即位为魏明帝。他当太子的时候，不交朝臣，不问政事，只是潜思读书。在历代君主中，这样的开初表现算是良好的。

即位后，大臣都想一睹风采，他却只接见了侍中刘晔，谈了一天，大家都问印象如何？刘晔说：“秦始皇、汉孝武之侔（辈），才具微不及耳。”刘晔说得委婉，也有逢迎拍马之意，但塞去浮华之词，其实就是志大才疏之意。

曹睿即位的头几年，应该说颇有些新气象。比如227年，听说诸葛亮抵达汉中，就想大举进攻，以此询问散骑常侍孙资，听了一番分析后，觉得很有道理，便停止了进攻计划。再比如，当初曹丕废止五铢钱，以粮食和丝绸代替，结果弄虚作假的越来越多，臣子建议恢复铸造五铢钱，曹睿便同意。还比如，他经常说：“狱者，天下之性命也。”为此采取了不少办法来规范优化，诸如采纳臣子设置法律博士的意见，下令司空陈群、散骑常侍刘邵等修改汉朝法规。这说明，曹睿能够虚心纳谏，同时也能关注治理中的一些疑点、难点加以解决。

230年，代理司徒董昭上书说，“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搞起团团伙伙，相互恭维，对依附自己的人就百般美誉，反之就百般挑剔，甚至说今世还有什么忧虑不能消除呢？只怕人际关系不够，朋友不多；还有什么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呢？只要加入了小圈子结成朋党，别人对你就百依百顺，说话像蜂蜜一样甜。这样的不良风气，看来古代曾经盛行，今天亦曾有过，关键在于要敏锐感知并坚决遏制。

面对董昭之谏，曹睿很认同，还从制度上加以改进。下诏说郎官必须通晓一种经典才能当地方官，“博士课试，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罢退之”！然后把诸葛亮、邓颺的官职给罢免了。可以说，曹睿此时还是很能听善言的。

若果曹睿就此不断地开新局面、造新气象，延揽贤才，曹魏之兴盛亦是必然。

后期执政利令智昏

可惜好景不长，到了232年，曹睿的政风就开始变得凌厉刚愎起来了。

曹睿在识人上缺少大智慧，主要体现在对司马懿的判断上。他曾经问陈矫：“司马公忠贞，可谓社稷之臣乎？”陈矫说：“朝廷之望也；社稷则未知也。”这说得很是直白了，但曹睿并未警醒。到了239年临终时，曹睿还把幼子曹芳托付给司马懿。与刘祁阳用人乃至托孤之精准相比，真是判若云泥。

在当政中期，曹睿多欲的本性就开始暴露，其恶行劣迹及其臣子力谏之声不绝于耳。235年这一年，曹睿开始大兴土木，建了许昌宫，又建洛阳宫，又建昭阳太极殿，筑成高10余丈的总章观，而致劳役不已，农桑失业。司空陈群力谏，他也不过是稍减省而已。

中书侍郎王基上书，劝他留意舟水之喻，珍惜民力，又说，“今寇贼未殄，猛将拥兵，检（约束）之则无以应敌，久之则难以遗后，当盛明之世，不务以除患，若子孙不竟，社稷之忧也”。这其实已经看出了司马懿专权的端倪，预料到日后江山社稷之大患了。如此忠言，“帝皆不听”。

孙盛正面评价曹睿的有不少，诸如沉毅好断、度量宽宏等等，却批评他“不思建德垂风，不固维城之基，致使大权偏据，社稷无卫，悲夫”！曹睿12年当政可谓毁誉参半，其奢侈放纵，就难有德政。不着眼江山社稷，思虑长远，必然遗患后世。

失去民心是最大的德不配位

综观曹丕、曹睿当政的近20年，说其守成，不过是使政事及社会能保持正常运行。但两人在用人上未见明显建树，却因个人私德行有亏，又常因私德而废公事，逐渐让士人与百姓之心疏离。人心疏离，正是政权长久之大忌。

## 天命无常，唯有德者居之

曹魏政权短命启示录（下）

□ 陈家兴

曹芳即位时年仅8岁。正所谓“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之时。历史上很多王朝的衰亡，表面上看多与此相关，无非就是士人之心、百姓之心不附。而造成此种局面的根源要往前追溯，即其前任一不善用人，二导致人心之举，以致整个社稷都渐失士人之心、百姓之心。换句话说，就是没有为长期执政打下坚实的组织基础、群众基础。等到幼主登基，必然导致大权旁落，江山易主。曹丕、曹睿正是在这两个方面失了人心，导致曹魏政权基础不稳。

曹芳任上，无能之辈曹爽执掌权柄，他岂是司马懿的对手？249年，司马懿杀掉曹爽，自此权柄归司马家族。254年，曹芳被司马师废掉，14岁的曹髦被扶上帝位再成傀儡。260年，曹髦被杀，15岁的曹奂被扶上台。5年后，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即位，是为晋武帝，西晋从此登上历史舞台。

事实上，曹芳和曹髦亦曾先后计划铲除司马氏，却未能如清代少年康熙除掉鳌拜那样，从此巩固政权。其中原因，固然有二曹暗弱不如康熙智敏之故，更重要的原因乃是，鳌拜不过一权臣而已，但司马家族渐得士人之心、百姓之心。正所谓天道循环，古代帝王自谓“天子”，但广大百姓才是真正的“天”，即“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古人常讲“天命无常，唯有德者居之”，说的正是王朝兴亡的根本原因。君主失道失德，则天命不归，人心不附，再强大的江山也必然会拱手让于有德之人。这个“德”，当然不是一般的忠君护主之德，而是“行大道、民为本、利天下”，以百姓心为心、以人民为根本的大德。

相形之下，三国时期，司马家族虽在专权窃位上德亏，却算是相对的有德之人。比如，有人在司马昭面前指责阮籍放荡不羁，应该流放到蛮荒之地。但“昭爱籍才，常拥护之”。再比如，司马昭用人得当，于263年伐蜀成功。

就在魏国伐蜀时，吴国有人和襄阳人张悌就曾一起分析当时形势。吴人认为，司马氏得政以来，国内屡有大乱，百姓未服，今又劳力远征，肯定要失败。但张悌认为不是这样。他说，曹操虽然功盖中原，但百姓畏其威却不怀其德。曹丕、曹睿继位后，“刑繁役重，东西驱驰，无有宁岁”。而司马懿父子累世立有大功，“除其烦苛而布其平惠，为之谋主而救其疾苦，民心归之亦已久矣”。即便曹髦被杀，四方也没有发动叛乱。更关键的是，初期的司马家族“任贤使能，各尽其心，其本根固矣，奸计立矣”。张悌由此认为，伐蜀必然获胜。这一番分析，其实道出的正是天命何以归司马氏而不存于曹魏的根本原因，可谓至论。

